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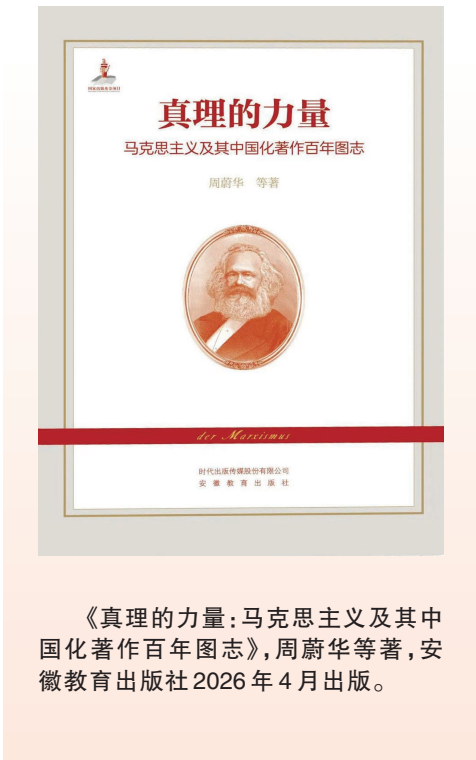
以书为媒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

刘金祥

《真理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著作百年图志》(简称《真理的力量》)以“图志”这一独特的学术体裁,系统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中国化成果百余年来翻译、出版与传播历程。在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日趋深入的学术语境中,本书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研究范式——不是从理论推导理论,而是以“书”为媒介,通过考察文献的物质形态及其社会生命史,将抽象的“真理力量”具象化为可触摸、可追踪的历史实践,从而揭示了出版传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扮演的“主力军和主阵地”的关键角色。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侧重于思想史的考察和理论逻辑的梳理。学者们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如何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阐释和改造,如何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进而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这一范式固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脉络,但在“传播”这一关键环节上——理论从文本转化为群众实践力量的中介过程——往往着墨不足,或仅作为思想史叙事的背景予以简略处理。《真理的力量》一书的独特贡献在于,它将学术视野从“思想如何被阐释”转向“著作如何被传播”,将出版史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核心议程。全书以时间为经、以著作出版为纬,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出版置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不仅“马克思主义著作版本学”意义上的史料编目,更是以出版物的生产、流通和接受作为分析对象,透视理论如何经由物质载体完成其社会动员和历史实践功能的深度研究。

从方法论上看,《真理的力量》开创了一种“以书证史”的研究范式。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然而,“理论掌握群众”绝非自动发生的过程,它需要一套复杂的社会机制——其中出版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



《真理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著作百年图志》,周蔚华等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

环。本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再版全过程的梳理,将“理论掌握群众”这一哲学命题转化为可研究的具体问题:哪些著作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被哪些读者群体接受?出版活动如何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知识谱系和话语体系?革命出版活动又如何培养了一代党的领导骨干?这些问题在书中均有细致呈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学研究的鲜活素材。

“图志”体例的运用,是本书在学术表达上的重要特色。所谓“图志”,并非单纯地在文字叙述之外附以插图,而是以书籍的实物形态——封面、版权页、版本变迁、装帧设计、出版机构沿革等——本身即作为史料和史证,与文本分析形成互文关系。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中国百余年的出版历程,恰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思想史、革命史和出版史。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被零星介绍到中国,到20世纪初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规模化翻译出版,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进入新阶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大量涌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标志性的出版物作为时代的注脚。本书对这些著作的版本形态、出版机构、发行渠道、读者反馈等进行系统梳理,使得抽象的“思想传播”呈现出可观察、可测量的历史形态。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代表人物著作出版历史的考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简单地将经典理论“应用”到中国情境中,而是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实践,在理论形态上实现了一次深刻的主体性建构。《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的整理问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的出版传播,这些不仅是出版事件,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得以确立、确认和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书籍的出版,在此意义上,构成了理论权威化、经典化的制度化过程,是思想史本身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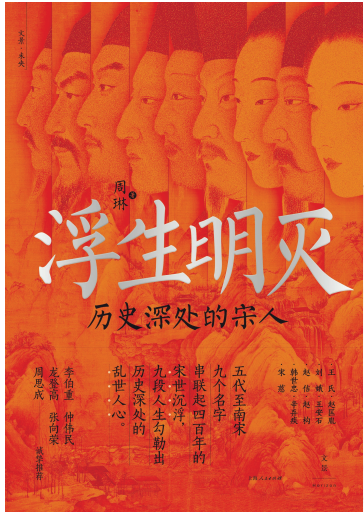
从学术价值的角度审视,《真理的力量》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野。传统研究多集中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而本书将出版学、传播学的分析工具引入其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方法论资源。出版物不仅是思想的载体,更是思想得以社会化、制度化的物质基础。将出版活动纳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克服以往研究中“重文本轻语境”“重思想内涵轻传播机制”的偏向,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更加立体化、过程化。第二,为当代中国主题出版实践提供了历史镜鉴。主题出版作为当代中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巩固主流思想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与传播的重要使命。《真理的力量》通过对百年马克思主义出版史的系统梳理,总结了不

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对于当前如何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主题出版工作,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第三,在学术传播和公众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图志”体例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使本书不仅适用于专业学者的研究参考,也可作为党员干部、高校师生乃至普通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历史的重要读物。书籍的物质形态本身就是历史的讲述者,本书通过对大量珍贵书影、版式、装帧的呈现,使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面貌,从而获得比纯文本阅读更为丰富的历史认知。当然,作为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本书也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例如,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普通读者群体中的接受和反馈情况,受限于史料条件,书中着墨相对有限;对不同历史时期读者阅读行为、书籍流通网络等传播社会学层面的深入分析,也有待后续研究的推进。此外,数字化时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新型传播方式——电子书、数据库、网络平台等——对传统出版模式的挑战与重塑,同样是值得延伸探讨的议题。这些不足非但无损于本书的学术价值,反而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拓展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真理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著作百年图志》一书正是以“书”为路径,以“出版”为方法,对这一历史进程作出了独到的学术阐释。它提醒人们:真理的力量不仅蕴含在理论本身的逻辑严密性和解释力之中,也体现在承载理论的物质形态如何穿越时空、抵达人心、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更是一部以书籍为主角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它让每一本书都成为历史的证言,也让真理的力量在书页的翻动中变得触手可及。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王安石失败了吗？



摘自《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周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



明朝有一部畅销的世情小说——《警世通言》,其中第四卷名为《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就是一个关于王安石的“社死”故事。

话说王安石经历了变法失败、老年丧子的打击,隐姓埋名,独自赴江宁养老。然而一路上不管他走到哪里,都听到形形色色的人骂他和新法。他所到之处,街市、店铺、庙宇、驿站,甚至茅厕里,都见缝插针地写着挖苦、诅咒他的诗文。

一日傍晚,为了寻个清静,他特意挑了一所偏僻的乡间茅屋借宿。第二天清晨,王安石早起,恰好看到房东老太太在喂牲畜。老太太拿着木勺在食盆中边搅边唤“罗罗罗,拗相公来”,两头猪闻声而至;老太太又唤“粥粥粥,王安石来”,只见一群鸡小跑着过来。原来这地方的人们深受新法之害,“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当作畜生。今生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警世通言》流行的年代,距离王安石变法已经快600年了,人们还没有停止对王安石的群嘲。然而,就算王安石被人们的唾沫星子淹死,他真的失败了吗?不见得。

其实王安石变法,贯彻的是北宋的国家意志。北宋的国家机器空前费钱。北宋建国后,很快就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地方财富以“上供”的形式集中到中央,由度支、盐铁、户部三司统筹支配。皇帝直接掌控“三司”,密切关注财政的盈亏虚实,亲自过问政策制定。而且北宋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依赖商品专卖、盐、茶、酒、醋、铁器、矿产、香药、煤炭,全是百姓无权涉足、官府垄断经营的领域。

在财政的问题上,北宋从来就不是一个“慈

眉善目”的国家,它的“手”从一开始就伸得很长。然而在北宋的前100年,国家还是给经济留了一些空间,比如“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宋史·食货志》中有这样一段话:

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而又田制不立,刈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

所谓“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就来自于此。然而“不立田制”不是说宋朝没有土地制度,而是没有对土地实行大规模的强制再分配;“不抑兼并”也不是说国家鼓励地主恶霸兼并土地,而是取消占田限额,允许土地在市场上自由买卖。

北宋前100年奉行这样的国策,不见得是出于国家的宽容与善意,但是客观上的确造就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允许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 经济环境,至少在某一 些领域、某些地区是如此。所以北宋的前100年,民间经济的成长也是肉眼可见的。

第一,人口的飙升。据现代学者推算,北宋人口从开国时的1270多万飙升到了1亿多。这1亿多人口,让整个经济的蛋糕有了做大的可能。

第二,占城稻的引进。北宋的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地区以种稻为主。然而在1021年以前,这一区域普遍种植的是一季晚生梗稻。这种水稻单产量高,但是生长期长,对土壤、水分的要求高。1011年,两浙地区春季大旱缺水,原有的梗稻无法播种,所以宋真宗遣使从福建取回了一个原产越南的新品种,早熟、耐旱、耐瘠。早熟使它能避免江、淮、浙夏秋季的干旱;耐旱使它可以在灌溉条件差的梯田中种植,甚至可以种在旱地;耐瘠使它

不挑土质,随处都能生长。这就是“占城稻”。据说占城稻自引入以后,几十年的时间就在北宋的稻作区推广开来。稻农的种植作业变得更加灵活,而且有可能降低生产成本。

第三,以漕运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北宋初年,建成了以首都开封为中心,以汴河、五丈河、蔡河、金水河为主干的运河网络,连通了淮河、黄河、长江三大水系,将全国主要的财富产地与国家的核心地带贯通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物流体系——漕运。依托漕运,原来孤立的区域市场被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补充、更有效率的市场体系。

第四,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姜锡东先生认为,宋代生产力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制造业。在宋代生产力的至少45项发展中,农业只约占约15项,制造业则占了至少30项。在采煤业、金属冶炼技术、制瓷业、纺织业、造纸印刷技术、兵器制造技术、造船业、航海技术、茶叶加工技术、复合型机械制造技术、刻书业等方面,宋代都有亮眼的表现。

总之,在100年相对宽松、务实的经济生态中,北宋的民间积累起数量不菲的财富。到了神宗时期,国家财政吃紧,朝廷自然想到民间还有财源可挖。而王安石变法,就是将民间财富汲取到国家囊中的一次大规模尝试。

所以上文讲到的法令,大都涉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交易。有时是民众向国家交钱,有时是民众向国家贷款,有时是民众帮国家干活,有时是民众向国家购买商品。总之,要让民间的财富(尤其是货币形态的财富)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向朝廷、国库汇聚。

虽然王安石声称改革的宗旨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财富就那么多,国家得到了,民众自然就会失去,没有两全的办法。在国家主导交易、决定价格的情况下,很难严格地约束自己不侵犯百姓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变法的几乎所有法令,都令民众有强烈的被侵害感、丧失感。

更进一步地说,在王安石变法中,北宋变成了一个更加财政集权、高汲取型的国家。而这个结果从北宋建立高消耗的国家机制、高度集权的财政制度时,就已经注定了。就算没有王安石,也会有别的人,用别的方式开启这个转变。

其实王安石错就错在,把一切想得过于简单了。在主持变法之前,他为此“使命召唤”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尤其是以科举考试顶级精英的身份,一头扎到基层,一干就是十几年,实在是够真诚,够务实。但即便这样,也还是不行,因为他面对的是1亿多的民众。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传统国家治理过如此巨量的民众。

不管各项法令经过怎样的用心设计,一旦平摊到1亿多人的头上,落到无数的基层社区,就一定会走样。因为每个人对同一件事的理解都不一样,每一个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样。民众不仅仅是被法令指挥、约束的“工具人”,他们还会钻法令的空子,去反抗制度,甚至去“玩”制度。于是,那些“逃逸”在政策制定者视线之外的情况,就成了滋生问题的温床。

比如让百姓帮官府养马,变法团队周密地考虑了方方面面,但只要漏掉了马要吃多少草料、农户有多少田地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这个法令就必然失败;又比如清查土地和户口,如果不普查工作每一个环节的难度有充分的考虑,最后这项工作必然掀下葫芦起来瓢,或者干脆烂尾。

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发现,人类历史上许多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最后只得到悲剧式的结果,原因就在于:

那些项目背后的预言家和设计者犯了自大的毛病,忘记了自己也是凡人,行动的时候似乎觉得自己是上帝。

所以,做1亿人构成的巨型复杂系统的“话事人”,真是地狱难度。因为基于人有限的理性,决策必然有漏洞。而决策一旦有漏洞,就一定会出乱子。集权程度再高的体制也只能做到“一声令下”,却无法确保“整齐划一”。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并非不严谨、不真诚,却屡屡翻车,事与愿违,原因大致在此。

但更要说明的是,王安石的改革并没有随着法令的废除、王安石本人的隐退而湮灭。相反,它就像一次社会实验,虽然不成功,却留下了大量的经验和数据。后来的王朝统治者可以在这些数据、经验的基础上妥协修正、加加减减。所以元明清时期,许多旨在汲取财富、治理庞大人口的政策,都有“王安石变法”的影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输了人心、舆论,却赢了时间。



《斯文在兹:明代知识人画像》,陈宝良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

走出书院 走向众生

刘学正

长久以来,大众谈及明代读书人,脑海里往往固化出几类单薄形象,要么是周旋于朝堂、固守儒家经典的士大夫,要么是拘泥礼教、略显迂腐的道学中人,市井匠人、行商坐贾乃至闺阁女子,似乎都与传统认知里的“斯文”二字相去甚远。明史专家陈宝良的《斯文在兹:明代知识人画像》,打开了明代社会文化史新的观察视角,旨在走出片面的历史印象,真切触摸明代知识阶层多元鲜活的整体面貌。

作为深耕明史研究多年的学者,陈宝良延续了其一贯扎实的治学风格,结合历代政书、明人文集笔记杂录等大量史料,跳出传统史学聚焦朝堂精英的叙事框架,提出明代逐步从士大夫社会转向知识人社会的论断。全书以“斯文”的流转作为主线,划分出“乡先生、道学先生、文人、名士、商士、工匠、儒医、女郎”八类各具特色的知识人群体,多维铺展明代知识版图的扩张过程,呈现出文化权力由上层庙堂悄然流向市井民间的趋势。

书中,每一类人物都有着属于自身时代的坚守。致仕归乡的乡先生是地方教化的标杆,他们维系着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却也在世事更迭中慢慢失去往日的影响力。潜心治学的道学先生并非千人一面的模样,有人恪守本心钻研义理,也有人流于表面故作姿态,人格的分化折射出明代理学发展的复杂走向。擅长诗文的骚人墨客、追求自由风度的名士,以才情装点着明代文坛,在礼法约束之外活出别样的姿态。

传统四民秩序中,商居末,匠为贱。但明代“士商互动”之后,商人开始崇儒好文,工匠凭借技艺获得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同,甚至出现“工匠知识人”。作者的笔触没有停留在社会地位的升降,而是追问知识本身的变化:当匠艺被视为一种职业知识,当“奇技淫巧”被重新评价为“匠心独运”,知识的标准就不再由儒生一手把持。同样,儒医一章也很有意思,医家从“不为宰相则为良医”的情怀,走向了职业精神的重建,其间医儒互动的细节,透露出明代社会对实用知识的接纳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全书最动人的部分或许是对女性知识人的书写。传统印象里,明代女性要么是烈女节妇,要么是名妓才女,形象单一。她们有知识、有才情,也渴望名士化,但始终困在情色与德行的夹缝中。黄媛介、柳如是等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段风流韵事,还是女性如何在男性主导的知识世界里争夺话语空间的艰难历程。作者没有刻意拔高,也没有简单同情,而是把她们放进“知识人”的框架里,一窥明代社会性别与知识之间的博弈。

依托自题画像、自祭文等私人文献,作者得以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类脱离官方正史记载的文字,褪去了刻意塑造的标准形象,留存下书写者真实的思绪,让读者得以看见个体在时代中的选择。有人坚守传统理想,在世俗洪流中守护心中的斯文;有人顺应社会变化,跨界转型寻找新的生存方式;有人追逐个性解放,挣脱世俗规训活出自我。一个个具体的人物选择,串联起明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脉络,让冰冷的历史记载拥有了温度。

斯文无界,不因身份职业而受限,亦不因男女之别而阻隔。商贾有诗情,工匠具学识,医家跻身士林,女子雅集唱酬。知识一旦走出书院、走向众生,就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成为整个社会可以参与、可以重塑的活水。一个时代的文明高度,不取决于书院里有多少人在讲学,而取决于市井坊间有多少人在读书、在思考、在创造。

